

于敏文集

第八卷
报告文学·散文

 中国电影出版社

于敏文集

第八卷 报告文学·散文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5 · 北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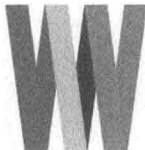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于敏文集. 第8卷, 报告文学·散文 / 于敏著. -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 - 7 - 106 - 04107 - 6

I. ①于… II. ①于…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1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43855 号



CHINA LITERATURE
AND ART FOUNDATION

中国文学艺术基金会

中国文学艺术发展专项基金

资助项目

于敏文集 第八卷 报告文学·散文

于敏 著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邮编 100029

电话: 64296664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64296742 (读者服务部) Email: cfpvgh@126.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4 月第 1 版 2015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787 × 1000 毫米 1/16

印张/15.25 字数/29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 - 7 - 106 - 04107 - 6/I · 0988

定 价 45.00 元

编委会

主任委员：康健民 宋 岱 胡子光

副主任委员：谢 力 刘 伟 徐 劲 李春妹 于晓燕

委 员：藏燕红 秦 赞 古 力 张玉民 李 静 于昕彤

统 稿：于晓燕 于昕彤

第八卷目录

散 文

教益所及 不只一代——悼念夏公	1
痛悼林杉	6
悼刘岷	11
痛失黄钢	14
悼草明	20
怀念陈宗棠	23
勤勉奉献的一生——深切悼念徐宜同志	26
永恒的记忆	32
忆蜀娥——纪念原长影党委副书记李莫愁	34
《忆王滨》序	38
王滨早期的艺术活动	40
艺海击浪六十年——回忆文艺多面手颜一烟	70
一次愉快的合作——忆沙蒙	75
红军战士的轶事	80
罗丹美术馆所见	85
蒙特卡洛一夕	89
巴黎公社墙抒怀	95
田舍家一夕	100
雨中镰仓	103
记车夫人——兼及马蒂斯美术馆	106
为和平、为友谊、为新人——忆世纪性和世界性的国际电影节	109

祭窗前树	139
抚今思昔	141
忧劳可以兴国	143
“不足惧”和“深可畏”	145
农民是共和国的大功臣	147
风景和杀风景	149
真想找个地方避避这“洋风”	151
司马光论教化与风俗	153
真团结才能真繁荣	156
热心使我心热	158
我有自由么?	160
矿难频仍谁之罪?	162
向文学史专家求教——我国人民新文艺应从何时划代?	164
大益于我三短文	168
晴雯逝前一细节	170
刺心的微笑	172
“坐怀不乱”辩	174
不必迷信名家	176
一字之错	178
荒苑碎语——开博的话	180
诚挚的希望	181
也谈风月	183
《纽约时报》何其多情	185
马克思,你在哪里?	188
美国“缘何要输出民主”?	190
来自伊比利亚的雷声	193
为劳动人民立传——《老孟泰的故事》再版前言	195
《王秀兰和姐妹们》再版后记	199
《工人短篇小说集》序	203
《石挥·蓝马·上官云珠表演艺术》序	207
《希望之路》序	209
《银海坦言》序	213
《东瀛奇葩》序	217

《青春的遗书》序	222
《风雨疏枝集》序	225
勤奋的作业——《何鸣雁电影剧作选》序	230
跋宋杰文	235
《于敏散文集》自序	238

教益所及 不只一代

——悼念夏公

我最早读到的电影专著是《电影导演论》，著者是普多夫金，译者是黄子布。我最早读到的几种苏联文学论著中，有柯根教授的《伟大的十年间文学》，译者是沈端先。我最早读到的几部苏联长篇中，有高尔基的《母亲》，译者也是沈端先。这两个名字和夏衍联为一体，在我心中成为一个人，是30年代中期的事。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延安鲁迅艺术文学院工作。大概是在1941年末，我秉张庚同志之命，搜集左翼戏剧和抗战演剧的资料，拟将资料分门别类为不同的专题，以供参考。在众多的作者中，我发现夏衍的舞台剧作和电影剧作和论文几乎是最多的。30年代中期，随着基希的《秘密的中国》被介绍进来，先进的文学界提倡报告文学。就我所见，这一时期最早也是最好的报告文学之一是《包身工》。一个才华横溢、是多面手也是快手的作家的形象在我面前高高地站起来了。真乃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第一次见到夏衍同志是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我只能仰望而已，没有接近的机会。后来我在外地活动的时间多，在京的时间少。同这位前辈接触较多是在“翠明庄会议”期间。那是1962年春，中国影协为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年，邀请一些人来京写文章，住在翠明庄（从名称可联想柳绿桃红的别墅，实则处于闹市的旧屋，日夜车声震耳），即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主持此事的是袁文殊，领导此事的则是夏公和陈荒煤。在一个多月里，开的会有四次，每次夏公都亲临指导。这一代老革命家的最大特色是平易近人、热情诲人、真心助人而律己则颇严。参加会的外地来者除我，还有张骏祥、柯灵、瞿白音等，在京的则有陈播、程季华、耿西等人。

文艺界人士不会忘记，1962年春天是文艺界的春天。从“反右”和“反

右倾”的紧张心理超脱出来,也从“大跃进”的狂热清醒过来。人们都想轻装上阵,有所作为。会议谈的都是关于电影管理、体制改革、电影队伍的培养和提高、创作的百花齐放等等。这个春天也是我心情最愉快和加强进修的春天。白天读书作文,晚上看各国各种流派的影片。夏公几乎每天都到,挤在招待所的小会议室里看电影,同时也和大家一起议论。有两件小事我印象极深。一是他说在香港办抗战报纸时,他每天都要写一篇文章,或社论,或杂文,当然都是密切配合当时的斗争任务。这样的思维敏捷,下笔如风,斗志昂扬,实在使我心折。一是在谈到电影剧作者日见其少,好剧本不多,应有一定数量的文学作品改编时,他说自己搞创作眼下有困难,情愿像老太婆补衣服那样,帮助有写作才能但是不懂电影特点的青年人指指点点和修修补补。^①

夏公的思想活力、创作活力(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社会工作的活力都是惊人的。我特别惊奇于他的记忆力的准确。人和事当然不用说了,党的历次重大会议,文艺界电影界的重要会议,举凡会议的年月日以及会议的主要内容,他都能随口而出,丝毫不爽。天赋是一方面,我想主要还是在勤思和苦心。夏公逝世,我深感悲悼。我们这一代失去了一位光辉的楷模。回顾夏公的一生,有许多方面是值得我们缅怀和学习的。

夏公成为共产党人是在1927年“四一二”之后。正是“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是“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是白色恐怖凶焰大张的时期。沥血刑场者以万千计,银铛入狱者也以万千计。这期间入党,其实是迎着刀口和枪口的冒险。没有崇高的理想,没有坚定的信念,没有为国为民而献身的精神是决然不成的。“四人帮”横行时期,夏公身陷囹圄达六七年之久,一条腿因骨折不得不扶杖而行。“十年动乱”之后,他毫不顾惜自己,仍然心气豪迈,精神矍铄,不遗余力地投入工作和写作,参加国内和国际的种种文化和友好活动。体虽残而志愈坚,时在今日,我以为这一点应当大书特书。共产主义的理想正受到嘲笑,社会主义原则被诬为僵化,无私奉献活该是傻帽儿,奢靡贿赂之风吹遍宇内,损公肥私之行布满人间。是非,美丑,善恶,真伪,在不少共产党人的头脑中是混淆不清的,甚至是颠倒的。这样的人能不在糖衣炮弹(国内的和国外的)面前倒下去么?不能正己,何以正人;未能治党,焉能治国。灵魂灭绝,财宝山积,又有

^① 众所周知,翠明庄会议被“四人帮”打成“黑会”。现在我查阅当时资料,这实是为电影事业集思广益、苦求良策的会。

何益。我们缺少黄金,更缺少的是像夏公这样一心为公为国,一心为社会主义事业而永远奋发的精神。没有这一点精神,黄金愈多必然愈助长腐朽。历史和现实已经证明,硬件(飞机大炮)摧毁不了共产党,软件(贪欲私心)则足能使硬骨头变成软骨头。夏公,夏公,你瞑目的瞬间,你最惴惴不安于心的是什么?

夏公是革命家,是文学家,是艺术家,是翻译家,是社会活动家,这五家在他身上是统一的。他一生的实践证明一条真理,愈是和时代的需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相一致,愈能写出好作品,愈能办成大事。 “左联”一成立,立即受到国民党及其御用文人的围攻。由刺刀保护的御用文人斗理论斗不过左翼了(电影方面主要是“软性电影论”),于是狂叫“拿出货色来!”似乎只有他们数人的几篇模仿外国“新潮”、为肉麻的哥儿姐儿写照的作品才是货色。而真正拿出佳作,扣紧时代的脉搏,打动老百姓的心,为他们所喜见乐闻的恰好是左翼的电影、文学、戏剧、音乐、歌曲、美术。在左翼文艺家群中,夏公的成就是排在前列的。十年内战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建国以后的时期,夏公一直保持旺盛的创造活力和工作的活力,直到耄耋之年。这在他的同代人中也是罕见的。他的话剧、电影剧作,电影和戏剧论文,报告文学、回忆录,所有这些都是我们弥足珍贵的遗产,是我们汲取经验和智慧的宝库。^①

夏公一生的文艺实践,总的看来,也是对于近十年来那些喧嚷器器、招招摇摇、自我膨胀、互相吹捧的种种时髦论调的有力驳斥。不讲社会主义文艺则罢,要讲,就必须坚持从左翼以来一直是主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拿来照照所谓的“讲话过时论”,“反映论过时论”,“人性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论”,“人类的大爱论”,“主体意识论”,“自我表现自我完成论”等等,究竟是从什么洞洞里放出来的,也照照这些论调哺育出来的作品究竟是有利于中国老百姓,振奋其人生理想,提高其审美情趣,还是有害于中国老百姓,斫丧其向上的精神,败坏其真美善的观念。有必要编印夏公的文集,向青年一代介绍夏公一生的业绩,帮助他们在阵阵迷目的西风面前方向明、腰板直、足跟稳,而不成成为随风飘零的败叶枯枝。我们的革命文艺之路确实是坎坎坷坷,曲曲折折,失误不少,其间遭受苦难最多的也正好是夏公这一代人。

很有意思的是我们老一辈革命文艺家不少是半路出家。鲁迅、郭沫若

^① 夏公的许多著作是大家熟知的,不必开列名单。

学医,茅盾先是干编辑和翻译,夏公是学染色。共同特点是他们都为了救国救民,为了战斗而拿起了文艺之笔。夏公出身于贫寒之家。勤奋的学习、优异的学业才使他有机会公费赴日留学。他干电影,成为中国新电影创始人之一,是奉党命“出家”的。他从不懂到懂,到成为行家里手,完全是从苦学苦练而来。1958年他为电影学院讲课时,曾详细地讲了他学电影的过程。30年代初,没有一本讲电影的书。他的课堂在电影院。他先阅读极简单的影片说明书,然后想象如果自己来处理,如何使那些情节电影化,然后看影片,同时借小手电筒的微光记下精彩的片断和细节。“为了掌握一点看电影的技巧,我有计划地看了许多电影,也作了不少笔记,可惜这些笔记在抗战中都遗失了。但是在这几年中我所学到的东西,不但对写电影剧本,就是对写舞台剧本也有好处,对于描写人物,刻画人物性格都有很多好处。我没有进过艺术院校,这方面的知识就是这样零零碎碎地学来的。”^①零零碎碎么?不错,却也是仔仔细细,用心良苦。我们新电影的第一批先驱者,不妨说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来的,不过不是平静的溪涧,而是波涛起伏的大河。

拍电影干什么?为谁?是为了博得洋大人的喝彩,还是为了中国老百姓的赏心悦目?为群众不能是一句空话。夏公的创作实践中有最可宝贵的一条,就是时时刻刻心目中有观众群。在电影院里,他不只研究电影,也研究观众,注意他们的种种反应。如果剧情是悲的,往往听到全场叹息,并有唏嘘之声。如果某些地方观众不安静,情绪不集中,就证明这场戏的处理有问题。“混在观众里,可以知道哪些地方观众感动,哪些地方观众不懂,哪些地方他们紧张,这是有好处的。电影好坏主要看群众的考验和评价。”^②此外,天下之大,社会之广,无处不是大课堂。感受什么,喜怒哀乐,因人而异。可见扣紧时代的脉搏与扣紧群众心理的脉搏是一致的。夏公作品的生命力在此,其雅俗共赏,深入浅出,起伏跌宕,委婉细致,受到广泛的赞赏,历久不衰,原因也在此。

我有意回避了夏公的遗体告别仪式,宁愿在头脑中保留一个活的印象。他那明锐和善的目光,那娓娓而谈的语言,那平等亲切待人的姿态,还有他后来扶杖而行的步势,历历如在目前。告别仪式之前,我曾与两位好友在他的住宅,向他的遗像鞠躬致哀,最后一次瞻仰了他的住室。小小

① 见夏衍《电影论文集》第96页。

② 见夏衍《电影论文集》第97页。

的书桌,用旧了的椅子,平板的木床,朴素的被褥,简单的文房用品,没有任何装饰。一生简朴,一生勤奋,一生无私的奉献。这是怎样的人品,这是怎样的风格,这是怎样的楷模!教益所及,风范所及,决然不只我们这一代。

沈从文

1995.3.2

痛悼林杉

面临艰险而无畏，历经坎坷而不挠，一生忠心耿耿，为党为国，世界风云变幻而理想愈坚定，这是真正共产党人的品格。眼光向下，胸怀群众，共忧戚，同欢乐，为师为友，为之讴歌，为之泣血，为之匠心独运，孜孜不息，生也有涯，创作无限，脉搏虽停而笔迹犹新，这是真正文艺家的品格。胸怀坦荡，光明磊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俭以自奉，厚以施众，宁朴拙而不炫巧，恒自惕厉而无逸纵，这是真正现代人的品格。正是因为这些，林杉同志的逝世，使我徘徊沉吟，悲戚于心，久久不能自己。十多年来，差不多朝夕共事，互相切磋，同心意、同声气的好同志、好朋友去了，去了……

我认识林杉是在全国解放、举国欢欣鼓舞的年代。大好河山是我们的了，光明的未来属于我们了。五星红旗不只飘扬在天安门上，也飘扬在每个人心中。人人都想一显身手，为祖国的兴旺发达而奋力。我们经历了多年战争的人，虽然一直属于“文军”的行列，面对电影这一新事业，却是初年级学生。这一代人常常面临从头学起的命运。谁原来是会打仗的，会办经济的，会搞科研的？不都是学来的么？不能忘记“花园饭店”那些美好的日子。这里是“电影剧本创作所”的所在。人们下去上来，上来下去，写成电影剧本，往往要受到“轰炸”。这个词现在不用了，它的意思是大家认真严肃地品评一番。不是因为完全没有写作经验，而是因为：一，还没有掌握电影这门艺术的特性；二，对于描写对象仍然还不够熟悉。尽管不少人都是“老”革命，但都还是风华正茂，颇有初出犊儿不怕虎的劲头。难是难在为中国电影开拓出一条新路，让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除了苏联）的文艺都不曾有过的新主人公，开创历史的工农兵登上银幕。向有经验的电影家学习，向外国电影特别是苏联电影学习，大家都表现出很高的自觉性。这一批初学者后来有不少成为优秀的电影家，林杉同志就是其中之一。

纵观林杉同志的一生,刻苦自励、永不停顿是他性格的本色。他的学习是刻苦的,而且涉及许多方面;他的创作活动是刻苦的,而且总在求美、求深、求新;他的生活也是刻苦的,饱暖已足,不求享受。战争年代当然是这样,可贵的是生活待遇提高了仍然是这样。

林杉于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一年后转为党员,1932年被捕,囚禁在杭州的伪陆军监狱。像一切革命者一样,监狱就是大学。在难友中,这个小李(他原名李文德)是最年轻的一个。他的聪敏和坚定颇受赏识,也备受爱护。敌人对共产党人是亦狼亦狐,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监狱斗争不但需要勇敢和牺牲精神,尤其需要机敏和应变的能力。林杉在对敌斗争的同时,不遗余力地涉猎一切可能到手的书籍。有关政治、经济、哲学、文艺的书刊,只能秘密传递。现代青年很难想象,在这些囚徒的心目中,一本唯物辩证法小册子比百两黄金更可贵。他们视共产主义理想高于自己的肉体生命。这些小册子一被发现,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严鞠和酷刑。同狱中碰巧有一位戏剧家刘保罗,林杉在校时就常常参加文艺活动,这时正好跟刘保罗学得不少戏剧知识。这对于林杉在抗日战争期间办剧团、写剧本、搞演出,都是大有裨益的。

全国解放,学习条件好多了。林杉转入电影之后,学习更加勤奋。我想用“贪婪”二字来形容并不过分(但愿一切革命者都“贪婪”学问,而不“贪婪”财货)。这里我要插入一件令人哭笑不得的往事。林杉于1956年下放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在他担任艺术副厂长期间,曾提倡学习“三论三史”,就是《文学概论》、《马列主义美学》、《毛泽东论文艺》、《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中国电影史》。明白人一眼便知,干文艺这一行。要干得出色,这“三论三史”是最基础的知识。古往今来,凡有大成就的文艺家,哪一个不是渊博精深的?可叹在“左”字当令的时候,这样的主张竟也受到非议和批驳。

在林杉的遗物中,我见到一册小笔记本,纸页已黄,其中密密麻麻写满小字,如六号铅字那么大,字迹清晰工整,仔细看看,原来是当年学习《联共党史》的笔记和摘录。像这样的笔记本他有许多册。请想想,在一灯如豆之下,这是怎样的艰辛,无怪乎眼睛熬成上千度近视。我不由想起白居易给元稹信中的话:“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因之“瞥瞥然如飞蝇垂珠在眸子中也,动以万数”。林杉不但高度近视,而且一目近乎失明,却仍然连朝接夕地苦苦研读。为个人名利么?当然不是。为的是于社会主义事业有更多贡献。革命人而不为事业成“魔”,不知其

可也。

近数年来,国家的经济状况成为林杉关心的重点。他留下了一册册剪报,都粘贴得整整齐齐,加了红笔的标记。此外还有不少关于经济的专著。“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全党全国衷心拥护的总政策,但不是每一个共产党人都关心和探究经济问题。和林杉相见时,我常常是从政治方面,他则常常从经济方面观察社会现象。我曾戏言,两人相加正好是政治经济学。当然两人都有很大的局限性,都不可能有真知灼见,不过是友谊的俏皮话而已。

林杉的确是活到老学到老,从文、史、哲到政治、经济。我不由得想起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当时毛泽东大声疾呼,号召全党重新学习一切不懂的东西。而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再一次谆谆教导,要拜一切内行人为师,不管他们是什么人。“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在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学习、学习、再学习”,我以为是一切人的首要任务。悼念林杉同志,正是应当效法他学习的自觉性、坚持性、刻苦性。

有了这样的学习精神,所以自然而然,林杉于电影艺术方面从不懂到懂,到深有心得,到莫立自己的创作理想,开创自己的创作道路。有人硬说全国解放后的十七年中,中国电影只是政治宣传品,没有艺术可言。这如果不是偏见,至少是片面的。十七年中,“左”风频吹,忽视创作规律,抹杀创造的个性,诚然在一定时期内导致电影创作的萧条,或者虚假的繁荣(如在“大跃进”年代)。但是绝非全部十七年,全部电影界,全体电影家都是无所作为于艺术的。不讲别人,单是林杉一人的作品也可证明这一点。

林杉的创作思想是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紧紧相连的。人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不同的渠道,不同的方法实现“为群众,首先为工农兵”的总任务。林杉正是有他自己的独特性。从《吕梁英雄》、《刘胡兰》到《上甘岭》、《党的女儿》,到他辞世前未完成的《凤凰涅槃》,明显有一条红线贯彻始终。他有一篇论文,题目是《在银幕上歌颂共产主义新人》,这就是他的创作思想,创作宣言和创作道路。我这篇悼文不能具体分析他的每一部作品,只是必须指出两点:一,他的全部思想感情,全部心血都倾注于他笔下的人物,因此这些艺术形象都有很强的感染力;二,他逐步学会了,娴熟了用电影的造型手段描绘性格和环境,使人物成为立体的而不是平面的,成为栩栩如生的。最能证明这一点的是《上甘岭》和《党的女儿》。

林杉的创作态度十分严肃,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他一生的创作道路,他那些由低到高,由粗到精的作品,都为我们留下宝贵的经验。他一生的

创作实践雄辩地证明马克思主义美学,毛泽东美学的真理性。他的创作实践也具有理论意义,可以据以有力地驳斥那些时髦的玩意儿,如什么“反映论过时”、“人类的大爱是创作的永恒主题”、“主体意识论”、“心灵是创作的源泉”、“艺术无目的,只是自我表现”等等。

唯物辩证法不承认永恒的东西。不是主观上硬不承认,而是客观上实在没有。“把爱和死当成文学的永恒主题,这是资产阶级文学的主张。”我曾重复这一论断,现在仔细想想,却以为不必把描写爱和死的权利全部让给资产阶级文艺家。我们已经有大量作品接触到爱和死。但是爱什么,为什么爱,什么样的死,为什么去死,则与资产阶级的文艺有本质的区别。成百上千的革命先烈之视死如归,不正是因为怀有对人民的深厚的爱,也怀有对妻子儿女的深厚的爱么?当然,同时也怀有对敌人的刻骨的仇恨。我讲这些是有感而发。林杉根据自己五年的囹圄生活,用了数年的时间,访问了数十位难友,搜集了数十万字资料,立志要创作一部描写监狱斗争的作品。深可惋惜的是他衔志以歿,极好的意图未能完成。林杉在他的草稿前面,写下了一段似乎是骈言的文字,“人生好比替换的赛跑,前人走几段,我走一段,后人又不断地向前走。”这段话是难友徐玮于1923年写的,当时只有21岁。这位先烈在给友人的遗书中有这样的话:“操刀必割,来日无多,趁此时机,略留数语,相知一生,一朝永诀,未免黯然。但我并不觉死有何痛苦。前我而去者已去,后我而来者会来。生活于此时代,便负有此时代之使命。人生之价值,即以其人对于当代所做的工作为尺度。我此刻心中非常平静,毫没痛苦。勿念。祝你和你爱人健康——我到现在尚无爱人,可怜哉。一笑。”遗书写于1928年,此后不久人就被害了。请看这是怎样的人生观,是怎样的价值观,是怎样的革命乐观精神,是怎样的正气浩然的英雄本色,而且人是这么年轻。这真正的精英,这优秀的成百上千的中华儿女,不正是应当为之呕心沥血,使之成为升华人的灵魂的文学典型和银幕典型么?

所以林杉又在后面加注曰:“以上为作品的主题,完全是老而又老的主题:为理想而献身。但它是高尚的文艺作品之永恒主题。今天需要,明天也需要。”说得多么好,特别是在今天,当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彻底变色,而在国内,剥削阶级的人生观、价值观又颇为流行的今天,说的又是多么及时。只要剥削制度还没有完全灭亡,只要大小剥削者仍在狂欢舞蹈,同时雇用“帮忙”和“帮闲”用种种花言巧语麻痹和毒害人类的灵魂,只要人类的大多数仍然挣扎在饥饿线上,“为理想而献身”必然是永恒的主题。

林杉同志一生坎坷,他遭受的曲折也是许多人在“左”字当令时所受的曲折。他一生俭朴自甘,不但不谋,而是从来不想私利。我说他是“布衣淡饭乐陶然,不学新贵务腰缠”。在为他致哀的时候,他的女婿敬献一幅挽联:“从来多坎坷,九死一生,赤心未改,为民为国。此去无愧憾,鸿文多篇,墨迹犹新,对地对天。”这是切合实际的写照。就是这么一位好同志、好朋友离我,离我们而去了。思之宁不悲戚,宁不泪洒胸襟?

1992. 4. 11